

在中华和谐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

徐子峰

赤峰学院历史系

内蒙古赤峰 024000

Keywords: 红山文化, 商文化 北方文明

ABSTRACT: 红山文化与辽河文明
特色与创新

一、对红山文化的内涵、特征进行了认真考证和辨析。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对其经济形态的分析予以重新审视,认为:其一,红山文化社会以往提到的以原始农业为主的提法不够准确,以西拉沐沦河北红山文化遗存为例,应是农业与狩猎、养畜、采集、渔猎经济并存;其二,由此推论,红山文化社会的原始农业也并非占主导地位,而只能提多种经济因素并存;其三,关于红山文化社会以及上溯至兴隆洼、小河沿文化存在的石磨盘、石磨棒问题,其作为工具功能仅仅认定为谷物加工工具似嫌立论不足,当为加工皮张、制皮的工具其可能性更大些(有些磨棒,并非圆形,磨盘上盛谷物几乎没有可能,不能解决谷粒下滑落问题,另外8500年的小河西文化时期,没有谷物出现)。

二、在一些相关论著中提到的红山文化积石冢下埋葬的墓主人的身份问题,该书观点明确,否定了中心大墓的主人是“王者”身份,认为是红山文化社会发达时期,一些大的部落或部族的巫覡,这时的“王者”并没有出现。

三、红山文化“女神”并非红山居民的祖母、“中华民族的始祖”,该神位与大鸟、猪龙同处一室,应是与地母神、社神相关联的神祇崇拜,与祖灵无缘,并且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

四、在红山文化与中国北方文明起源问题上,该书认为,红山文化从6500年到5000年在其分布的西辽河流域、辽西地区、燕山南北,积累了厚重的文明因素,孕育了中国北方的文明,尽管有晚期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的辉煌,但只是文明前夜的曙光,红山文化最终并未在辽河流域形成文明。

五、该书还对红山文化社会原生宗教对北方文明的孕育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作了独到的分析和论述。认为红山文化其文明孕育、文明因素的构建、发展模式与西方文明、中原文明有很大的差异,红山文化社会的文明孕育发展之路,经历了从族权——神权——政权三部曲,是特殊的经济环境、地缘环境,使这一社会祭祀繁多,巫术繁杂,造就了从巫覡、巫师、祭师、祭司到祭司集团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凭借神权最终获得了行政功能的指挥和垄断权,最终上升为凌驾于族长之上的神权领袖。

六、该书最后一章的特色更为明显,即提出和论证了红山文化与先商文明的渊源关系。红山文化在5000年时突然消逝后有三个去向,其主体人群南徙。著者以古代文献和考古实证,并借助人种学、考古方位学等为依据,论证了商族来自北方,是红山文化先民之后裔,红山文化则是先商文明的源头。

回顾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史,从20世纪30年代前后红山文化发现到70年代末的大约半个世纪时间里,红山文化一直是作为在中原文化影响下的一支边远文化,在中

国史前文化研究中属于“一带而过”的角色。80年代以来它的异军突起，当然主要是在辽宁西部的东山嘴特别是牛河梁，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址群和以龙形玉为代表的玉器群，但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提出了辽西地区5000年文明起源的新课题，也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从距今4000年前提前到距今5000年前，并将目光从中原移向中原以外地区。

由红山文化等考古新发现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一如继往地在不断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红山文化独特的内涵如积石冢所具有的神权社会分层；以中心大墓为特征的体现神权社会的等级分化；巫觋以玉通神通神及其独占权反映出的文明起源主线；最高层次聚落中心的形成等，都是人类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并且构成了东北亚文明前夜的曙光。

一、红山文化的性质与特色

红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很有影响的考古学文化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时，根据正在病中的中国考古学开拓者梁思永先生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这是长城南北两种新石器文化，即仰韶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相互影响，而在长城地带产生的一种新型考古学文化¹。1954年尹达先生把这一文化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田野考古调查深入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理论的发展，红山文化研究领域可谓“百花齐放”，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红山文化的历史地理分布、经济形态、意识形态、社会形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挖掘和辨析，一个相对真实的红山文化社会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确认

在红山文化正式命名前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这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是模糊不清的。最早进入赤峰地区（当时称热河）进行考古调查开始触摸探索红山脚下古文化的是日本和法国学者。1906至1908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先生三次进入内蒙古东南部和热河地区，此间对赤峰北英金河畔的几处新文化遗址进行了野外考察。六年后的1914年，鸟居龙藏发表《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西拉沐沦流域存在着史前文化遗存的信息。1919年—1924年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德日进对赤峰红山前后一带的远古遗址进行了野外调查，且搜集了一些古文化遗物。由于历史条件局限，他们对红山前后各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址没有形成清楚的认识。直到1930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在对红山古文化遗址进行考察后，发现了红山前后古文化遗存的差异，同时注意到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作为南北文化接触点和结合部的重要文化特征。

大约在1930年至1933年间，日本驻赤峰领事馆事牟田哲二和日人鸟取森男、金子健儿等先后在红山一带采集了一些文物分别送给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和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同年秋季，德永重康为首的所谓第一次满蒙调查团到达赤峰，在红山前后搜集了一些遗物并挖掘了几座石棺墓。直到这时，红山脚下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还没有被世人所认识，古老的红山还仅仅以自然景观吸引着游人的注意。

1935年5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任命京都帝国大学总长滨田耕作博士为调查主任，率领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水野清一、满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三上次男等人对赤峰红山后史前古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并于1938年东亚考古学会主办的《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六期上发表了《赤峰红山后》考古报告书，向世人宣布了赤峰红山后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存的重要信息。赤峰红山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地

遂成为中国北方文化摇篮的象征。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分析出沙锅屯、红山后的远古遗存是中原彩陶文化与北方细石器文化在长城地带相遇产生的一种混合文化，并提出了长城以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由北向南移动的路线。直到尹达先后发表《新石器时代》一书，才最终把这种出现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新型考古学文化定名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深刻内涵引起了北京大学的关注，1956年暑假由裴文中和吕遵谔领导的由七名考古学专业学生组成的考古组对红山后文化遗存进行了野外调查和复查发掘，并于1958年3月正式发表了《内蒙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纠正了滨田耕作对红山文化性质认定上的一些错误，使赤峰红山前、红山后的古文化遗存的特征及性质得以最后确认，为日后红山文化及其这一地区其他古文化的区分和研究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二）、红山文化的源流、性质特征和分布

对于红山文化的渊源和性质，大体有这样几种观点：1、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原始文化，或是仰韶文化的地方性变体；2、红山文化是继承了河北的磁山文化；3、红山文化很可能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到影响之后所产生的新的文化遗存，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或认为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一种典型的混合文化；4、红山文化是这个地区独具特征的一种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受到其它文化影响²。

红山文化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四点：1、石器方面使用量大，各类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多于陶器：磨制、打制石器与细石器共存，且多见大型石器，打、磨制技术并重，细石器以凹底等腰三角形石镞最具特色。研究者还发现，红山文化大型石器为主的石器群，多与农业生产有关，而多砍伐器和耜一类工具，缺少农田加工工具一铲类，可能是耕作面积广而粗放的反映。

细石器石刃和部分打制石器是同切割肉皮有关的，说明畜牧业仍占重要地位。这些情况说明红山社会是以农牧结合为主的定居生活。2、陶器以泥制红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夹砂灰陶中以压印之字形纹的深腹罐为主要器形。3、玉器以大型玉为主，多数为随葬品且多出土于石棺墓，器形多为动物形象，成组使用，用玉制度已出现。4、房址和墓葬。房址均为正方形，半地穴、有灶址。红山文化墓葬就目前研究的资料来看可分为两类，一是绝大多数为积石冢石棺墓，一是小型的石棺墓和土坑竖穴墓，已明显有早期、晚期之分。早期的表现出合葬墓多，随葬品多为石器、陶器，不见玉器，这种墓葬属于少数。晚期表现出山陵般气势，大冢之下，有序排列着大小不一，形制有别的石棺墓，并且是“唯玉为葬”，不见或极少见其他随葬品。

红山文化的分布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其范围基本明确。分布格局是以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北界越过西拉沐沦河，并有继续向蒙古草原深入的趋向。南部已达渤海海岸，东部界越医巫闾山，在辽北也有遗迹。西部线过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也发现了红山文化的遗存。

（三）、红山文化的分期与类型

随着红山文化基本特征的进一步明晰和田野考古的不断深入，一些新材料陆续发现，使红山文化不同遗存之间的某些地域性、时间性和类别上差异等问题明显反映出来。这样，为把红山文化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在更深层次上认识红山文化，有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对分期问题、划分地方类型问题提出看法，并对一些分布于不同地域及遗址所处不同位置的红山文化遗存做了系统分析。如内蒙奈曼大沁他拉遗址，分布于沙丘，多细石器，不见彩陶；敖汉四棱山遗址位于山坡高处，出彩陶甚少，而距四棱山约30公里的三道湾遗址，位于近河低台地，出土彩陶显著增多。另大凌

河流域多见罐式筒形器和线腹盆，不见红顶碗类³。有一学者则视发掘材料的多少，结合其它文化因素等不同特征将红山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1、兴隆洼F133遗存。目前仅在敖汉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有少量发现。2、西水泉类型。以赤峰西水泉遗址为代表，经过发掘的还有赤峰红山后，蜘蛛山和敖汉三道湾等地点。3、东山嘴类型。已发掘的遗址除东山嘴外，还有牛河梁、城子山、胡头沟等⁴。也有人从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分类排比组合入手，排列出红山文化各遗址所处期别。根据这种排比组合处于红山文化早期的遗址有海金山、赤峰蜘蛛山；处于早、中、晚期整个阶段的遗址有右旗那斯台、奈曼旗大沁他拉、赤峰红山后、处于早、中期的遗址有赤峰西水泉；处于早、晚期的遗址有敖汉四棱山；处于中期的遗址有敖汉三道湾子；处于中、晚期的有城子山和锦州沙锅屯遗址；处于晚期的有阜新胡头沟、喀左东山嘴、凌源牛河梁遗址⁵。

（四）、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是红山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论及红山文化玉器的论文和综述已逾百篇之多。自1971年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玉龙出土时起，随着各类玉器的不断发现，人们开始了红山玉器的研究。但70年代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玉器的发现只停留在一般认识水平上，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到80年代初，辽宁省的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一些文章，侧重于对所发现的玉器进行考证和鉴定，同时对红山文化玉器和其他同期文化玉器进行比较研究。到90年初，由于牛河梁积石冢红山玉器的大量出现，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已从考证与比较转向了某一器类的具体研究，开始分析探讨这类玉器的制作意图、反映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寓意。90年代中期以来，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深入，主要表现在：1、开始对玉器类型与用途进行综合探研和考证；2、探讨红山文化玉器特征对其玉雕艺术风格及与图腾崇拜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3、探索玉器的起源及玉器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⁶。回顾20世纪红山文化玉器发现与研究历程，有的学者做出了这样的概括：其一，60年代末以前，红山文化玉器属于未识阶段；其二，70年代，红山文化玉器初露端倪，在研究上属于初步认识阶段；其三，80年代，随着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顺利展开，出土了一批具有明确层位关系和组合关系的红山文化玉器，红山文化玉器群最终得以科学确认，并由此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该阶段红山文化玉器发现和研究取得了飞跃性进步，应属于全面认识阶段；其四，90年代至今，红山文化玉器研究开始进入纵深方向发展阶段⁷。红山玉器多出自墓葬或礼仪性建筑址中，出土玉器的墓葬多是玉敛葬，玉器多成组出现，且有一定的组合关系。在墓中的位置似已成定式，陈置摆放讲究左右对称，充分显示出浓厚的宗教祭祀色彩，具有礼的含义⁸。这种“以玉为礼”、“唯玉为葬”表明玉在红山先民心中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反映红山先民精神重于物质的思维观念。说明玉器在红山社会主要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通神工具⁹。

二、红山文化社会独特的经济结构

西辽河流域是红山文化早期遗存分布较多的地区，在聚落形态、经济结构、生产工具、墓葬习俗等多方面，本质地反映了红山文化社会的特点，印证了6000年左右这一地区原始农业的发达及养畜、渔猎业的繁荣。它以充分的考古学实证向世人昭示：红山文化社会是新石器时代

北方较为先进的经济社会，同时具有以巫或巫覡为起点，经由巫师、祭师、到祭司乃至祭司集团这一独特的原生宗教演进模式。这里和黄河流域同样，是人类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是北方文明的摇篮。

西辽河的上游是西拉沐沦河，发源于地处内蒙古高原的赤峰克什克腾旗百岔山。流域内大的地貌单元主要包括大兴安岭南段的低山丘陵，内蒙古高平原、沙地、黄土台塬及燕山北麓低山丘陵。在以赤峰地区为主的西拉沐沦河流域，平均海拔700—1100米，属于北方半干旱半湿润过渡带，也是北方农牧交错地带¹⁰，在全新世大暖期期间，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阳光和雨量充沛，植被繁茂，区域内水源丰富，沙地面积收缩，古土壤发育¹¹，因此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直到红山文化，西拉沐沦河流域一直是北方远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场所和舞台。据古地貌背景分析资料证实，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生产工具以掘土用的打制石器为主，也有翻土用的磨制石铲，砍伐用的石斧，标志着原始农业已经出现，但鱼鳔、兽骨和大量胡桃揪果实的出土，标志着渔猎和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¹²。赵宝沟文化时期的生产工具不仅加工制作精细，且出现了大型翻土工具石耜，表明农耕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大型生产工具如石耜、石斧、石锄、石铲、石刀、石凿的大量出现，则标志着该文化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原始农业处于大发展时期，与其他经济成分（渔猎采集）相辅相成，把史前西辽河流域的经济社会推向多种经济因素并存的新阶段。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西拉沐沦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相继被发现、发掘。一批批极富考古价值，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玉器先后问世，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资料表明，红山文化在西拉沐沦河流域其分布是广泛的，并向北部蒙古草原延伸至俄国贝加尔湖以东及远东南部。这些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的多个层面，证实了这里的经济形态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史前文化典型。它本质地代表了并体现着红山文化这一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亦农亦牧、亦渔亦猎、农牧交错且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为特征的史前文化的超前性和进步性。

西拉沐沦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存，绝大多数分布在内蒙赤峰市北部的翁牛特旗、巴林左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和巴林右旗境内。根据已发表的有关资料和信息，主要文化遗存有：海金山红山文化遗址

、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存、古日古勒台红山文化遗存、查日斯台红山文化遗存、左旗二道梁子红山文化遗存、白音长汗红山文化遗存、南台子红山文化遗存、洪格力图红山文化遗存、杨家营子红山文化遗存、黑德宝龙红山文化遗存、查干诺尔撒旗花红山文化遗址、查干诺尔馒头山红山文化遗存、大沁他拉红山文化遗存。从这些遗址出土或采集的生产工具分析，红山文化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以石斧、石铲、石刀、石凿、石耜、饼形器、细石器为主。如石斧共出土64件，石铲30件，石刀24件，石凿18件，石耜13件，饼形器20件，细石器298件，石磨盘18件，石磨棒63件；而石锄、石铲、石臼、石杵等工具相对较少。如石锄10件，石铲8件，石臼1件，石杵18件。这种比例，尽管有采集因素存在，但可大体反映出当时西拉沐沦河流域的经济结构是采集、狩猎、农牧等经济因素共存，农业经济尽管强劲发达，但未构成主导经济因素，采集与狩猎业仍是红山居民维持生命再生产和生活再生产的主要生产手段和方式。以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实证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条经济发展脉络。白音长汗遗址提供的考古数据资料表明，赵宝沟文化时期原始农业较之后来的红山文化原始农业更为发达，这从两个不同时期出土的与农业关系密切大型石器可见一斑。白音长汗遗址赵宝沟文化遗存仅石耜这类典型的翻土工具就高达40件¹³，还发现有大量的石斧存在；而在红山文化遗址仅发现石耜1件，可见红山文化时期的农业并未因时代的前进而强盛于赵宝沟文化。由此可见，人类文化的兴衰，特别是农业文化的兴衰与地理、气候、环境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赵宝沟文化时期正是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阶段，自然景观为典

型的暖湿带森林景观。而到了红山文化时期，这种暖湿气候逐渐下降，至晚期则逐渐形成了凉干气候，随之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古文化系列开始衰落。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西拉木伦河流域南部气候特征属大暖期暖湿气候晚期，相对暖湿适宜于农业文化的发展，所以呈现出定居农业高度发展景象。

西拉木伦河流域红山文化生产工具参照表

出土 遗址	石 耜	石 斧	石 锄	石 铤	石 铲	石 刀	石 锤	石 凿	磨 盘	磨 棒	石 臼	石 杵	饼 形 器	石 环	石 球	细 石 器	研 磨 器	石 矛
大沁塔拉		2		15	3	4		5	9	15		10				182		
海金山	1	6	1	3	1	7	6									18		
查日斯台	2	5	1	2		1			1	1				1		6	2	
南台子		2		1				1										
撒旗花		4			2	3				5								
馒头山	2	26		2	1			7	2	11			1		1			
黑德宝龙		4			1			1	1	1						15		
那斯台	3	4	6	3		4		2					13				3	
古日古勒台	4	3	2			1			2	5			1			12	1	
白音长汗	1	8		5		4	1	2	3	25	1	8	5		5	65	4	2

三、红山文化社会的特殊葬俗与神权阶层的形成

到目前为止，普通居民的墓葬尚未发现，即带有氏族墓地特征的墓葬尚属空白。现有考古学资料提供的实证表明，红山文化的墓葬均为坛墓结合的特殊墓葬。这种葬俗以石为载体，外部封土积石，形制或圆或方，周围均以立石砌成单重或双重祭坛，并围置彩陶无底筒形器。冢内有规律地排列大大小小的石棺。这种葬俗和形制从红山文化分布区已发现多处：西拉木伦河流域有内蒙古林西的白音长汗积石冢，巴林右旗洪格力图积石冢；老哈河流域有内蒙古喀喇沁旗锦山镇东南山，敖汉旗四家子镇草帽山积石冢，辽宁阜新胡头沟；大凌河流域的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积石冢，牛河梁积石冢。而尤以大凌河上游牛河梁一带最为集中，似已形成以积石冢为主要特点的红山文化祭祀中心。这里已发现红山文化遗址20多处，在有编号的16个地点中有十三处是积石冢。已经发掘的有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五地点和第十六地点。¹⁴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看，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布局和外在形制是，大多数分布于山梁或岗丘的顶部，圆形和方形相结合，早期的以圆形为多，中晚期的以方形为主，都是坛冢结合并以彩陶无底筒形器围砌。积石冢内的石棺墓多数有秩序排列，有的冢石棺墓有叠压情况并又打破关系。显然存有墓主人入墓的时间问题。另外一般积石冢内有一座或多座中心大墓。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形制具有多样性及其鲜明的特征。其内部结构及其墓葬形制更为复杂多变，存在各冢之间形制的差异；冢内部结构和墓葬形制的差异；层位和叠压关系反映出的差异；墓葬方向的差异。在这大大小小的冢丘之下埋葬的是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祭司和巫觋。所以，这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红山文化氏族墓地，而是与敬祖无缘神祇的场所，是具有祭天礼地功能的红山文化祭祀中心。红山文化积石冢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环太湖地区等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不同的石棺墓埋葬习俗以及随葬品只见玉器，极少见石器、陶器等特点，特别是红山文化积石冢的高大壮观犹如山陵，另有中心大墓，随葬玉器的规格之高甚至有规律组合等等，这些看来可以构成文明因素的诸多实证，还不足以说明和印证“王者”的出现，而东北文化区文明化进程的特点，具体说即西辽河流域史前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发展过度的鲜明特征却可以从中找到

线索和答案。即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因素的孕育和主导线索，并非单一的经济发

展因素，而是超世俗的神权垄断起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红山文化的埋葬习俗以石、玉为载体，展示的是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因素孕育的特殊历程及与传统理论背道而驰的鲜明特点。从石棺墓的线索看，早在七、八千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这种埋葬习俗即已出现，赤峰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最早的石棺墓，¹⁵并有巫玉伴出，说明与史前原生宗教相联系的祭祀习俗已经发生。而从石棺墓的规模及随葬品分析，这时的巫覡人员尚未专业化，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似乎还刚刚出现。西拉沐沦河流域多处积石冢石棺墓遗址的发现，加之这一地域另发现有大规模的红山文化遗址，如那斯台遗址、古日古勒台遗址、海金山遗址、查日斯台遗址、黑得宝龙遗址、查干诺尔撒旗花、馒头山、转山子等遗址的存在，印证着西拉木伦河流域是红山文化社会早期的重心腹地，亦是中国北方文明的主要源头。一个由巫覡开始，经由巫师、祭师、祭司到祭司集团的专业神职阶层从这里诞生并形成。随着红山文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内部机制的形成和不断完善，这一以主持大小不同规模祭祀礼仪活动为职业的神职人员其队伍日渐壮大，逐步越过老哈河进入大凌河流域，最终在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祭祀中心形成规模，而成为驾驭族权之上的祭祀集团。于是，这种以神权为基础，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的史前文明因素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已日臻成熟，但还属文明因素的积累过程，尚未发生质变，真正的文明社会还未曾到来。

红山文化埋葬习俗提供的考古学实证，非常具体真实地展现了西辽河流域史前 6500—5000年左右北方文明因素孕育、积累的过程和发展线索。其实早期文明孕育过程和形成主渠道无论北方的辽河流域还是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区乃至长江中下游流域、环太湖地区，都有相似的发展过程和经历，如良渚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等，只是红山文化提供的这条线索更加明了清晰。这种文明前夜文明因素形成的主导线索和特点与早期国家神权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统治者独占宗教祭祀权利的特征也是吻合的。

以石为载体的红山文化埋葬习俗相对中原仰韶文化葬俗而言，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墓葬的主人，不是红山文化社会普通的居民，而是红山文化不同时期主持大小祭祀活动的巫覡人员。这些人员有男有女或巫或覡，或巫师、祭师、祭司，他们生前来自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共同体或同一文化共同体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从积石冢的规模和随葬的玉器分析，红山文化早期的中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并逐渐南移，到晚期在大凌河流域形成重心。而从随葬玉器这一线索，可以看出新时代晚期史前原生宗教的嬗变以及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鲜明特点，同时折射出有别于中原同期文化独特的历史文化之光。

四、红山文化与先商文明

在距今5000年前后，出现了一次全球性显著环境突变，具体到中国东北地区同期也表现出栎树花粉减少的降温事件，使得本区持续了几千年的原始农业衰落下来，在不断恶化的环境压力下，最终导致考古学文化的消亡。¹⁶另有研究亦表明，世界各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普遍存在变化幅度加大的短期降温事件，中国各地区的

环境变化记录也发现在5000aB·p左右也存在一次降温过程，根据中国各地全新式孢粉植物群动物化石、西部冰川的消长，海平面变化以及天文背景研究等证实，在中国全新世暖期中，确实存在一次降温事件¹⁷靳桂云等通过对太师庄泥炭14c测年及孢粉和氧同位素的分析，也认为华北北部在4800dB·p—4200dB·p气候发生突变，出现了降温事件。¹⁸红山文化恰是在距今5000年左右，由于受突然降温事件的影响，在其分布的地域突然消逝，红山文化居民在西辽河流域消逝后去向何处的问题，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十分关注，多年来，很多学者依据文献学、

考古学等相关资料，探求红山文化的流向，已取得可喜的进展。笔者认为，降温事件后，红山文化先民群体有三个走向：有一支沿医巫闾山进入辽东半岛；另一支顺大兴安岭余脉越过蒙古草原进入现俄国贝加尔湖以东之远东南部；其主体部分沿渤海岸逐渐南徙，在驻足漳河流域之前，在冀北燕山南部京津塘一带留下了历史足迹，河北龙山文化雪山类型的依存提供了这一线索。考古资料表明，雪山类型二期依存的房址（半地穴式），石器如石磨盘、磨棒，石斧，双孔石刀，石镞，石铲及发现的大量骨器如骨刀，钩，镞，鏃等与红山文化的器物非常相似，存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唐山市郊发现的六座石棺墓，更以确凿的考古学实证印证了红山文化居民逐渐由大凌河流域南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遍布环渤海地区，¹⁹后与当地其他文化汇聚、交流，形成先商文化，又经过相当长时间与中原诸文化的碰撞、交融，最后成为先商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

1、商族来自北方。《史记·殷本纪》对先商文化十四代先公世系有明确记载：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任立。

主任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可见契开始的商十四代先公的世系是清晰的。那么，先王契来自何方呢，《竹书纪年》、《诗经》、《左传》、《国语》、《逸周书》、《世本》、《楚辞》、《淮南子·坠形训》、《吕氏春秋》都载有商族起源于北方或东北方的相关记录和线索。《国语·周语》载：“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荀子·成相》亦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里的玄王、玄鸟，如果从方位来理解，显然是说来自北方的王，北方的鸟族。不同年代成书的历史文献都有类似的记载，这不是简单的举证。它可以让人们从“玄”字产生定位思考，即与玄相联系的人和事亦是与北方有关的人和事。金景芳教授认为，玄为北方，玄王即北王。《淮南子·坠形训》载“辽出砥石”。高注：“砥石，山名，在塞外”。《世本·居篇》：“契居蕃” “蕃”通“亳”（古音通假）；《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左传·

昭公九年》“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史记·殷本纪》

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淮南子·地形训》载“有娥在不周山之北”

，又说“不周”在海隅，由此可知，有娥氏部落居于今河北省东北、辽宁省西南一带。《逸周书·商誓篇》“肆伐殷戎”；《世俘篇》“谒戎殷于牧野”；《尚书·康诰》“殪戎殷”；《国语·

周语》“戎商必克”；这些记载反映出商族与戎确有血缘或亲缘关系，另一含意是说商族源于北方戎狄之地；《竹书纪年》卷上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

。王国维考证，有易部落方位或在黄河以北或在易水流域，肯定是河北境内。商源自北方的另一佐证可见《逸周书》载，周灭商时“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禄父即太子武庚）后世历史有很多亡国之君在国家败亡后，远匿本族发祥地如元顺帝北归应昌府即是很好的例证。上述文献记载均表明，商族来自北方，起源于东北地区的西辽河流域及燕山南北。

2、红山文化属先商文明源头并逐步南徙。《尚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

王国维先生考证自契至于成汤八迁的地理为：“契居蕃”乃一迁，因契应随文帝喾居

亳，由亳至蕃是迁徙的开始；而“昭明居砥石”为二迁，后又“迁于商”为三迁；昭明子相土居商丘为四迁，而相土似在东岳之下有东都，可为五迁之据；《竹书纪年》载“帝芬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是六迁；“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丘”为七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乃为八迁。⁹《尚书》提供的“自契至于成汤八迁”的商族不断迁徙线索是准确的。但八迁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却难以确定。然而商族先世作为红山文化先民后裔的一支，从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即开始离开辽西地区及燕山北麓渐次南移的历史过程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相土时已靠近渤海，冥时达到了现今的京津塘一带。这从唐山地区曾发现石棺墓这一与红山文化埋葬习俗有渊源关系的重要线索可以得到证实。《竹书纪年》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亡，遂杀其君绵臣也。”表明王亥、王恒、上甲微时，商族处于游牧经济状态，活动地域在易水流域附近。据陈连开教授研究，大概从相土时起，已越燕山南下环渤海发展，其所迁的商当在燕山以南，历昌若、粮圉、冥至王亥时已发展至易水流域，其后进而南下漳水流域，即进入先商阶段。《诗经》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表明相土时商族向东迁移，已抵达渤海。《竹书纪年》云“（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又云“十三年，冥死于河。”冥治河而死，表明此时的商族已进入京津塘地区靠近了黄河。

3、红山文化属先商文明源头的人种学、方位考古学支持。

据潘其风先生研究，安阳殷墟中小墓③组系殷墟王陵以外氏族墓地中有一定规模的中型墓葬，均有成组的礼器及奴隶陪葬。由此可以推测，其墓主人的身份应有别于一般小型墓葬的平民，他们可能是受封的贵族，与王族关系密切，甚至本身就是王族成员。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中小墓③组的主人，表现为有很阔的面宽，头高中低或偏低，整个颅骨形体较大，颅质数属中颅型，鼻骨隆起，鼻根指数很高，呈现出具有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相混合的形态，很可能与古代北方民族有更多的关联¹⁷而另有研究数据表明，黄河中下游同期土著居民不具有这种体质特征。此外，1958年在河南安阳西郊王裕口村出土了一个人头陶范，外部呈半圆形，目、口、鼻、颧面刻的都非常清楚，印出的人面长11.8、宽8厘米，鼓鼻梁、高颧骨、小口、下颌尖、吊眼具有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该人头陶范出土于距地表约50厘米的灰层中，伴随出土物的有簋、鬲、豆等残片，与小屯所出相同。耕土下只此一层文化层，陶范当属殷代遗物。另据杨锡璋先生研究，“殷人尊东北方位”。²⁰这与商族的起源地在东北地区直接相关，因为上古众多民族都有把一个方位当作吉向尊位的传统，而这个方位正是指向民族的起源地。如夏民族源于中原地带的西北部，其后以豫西和晋东南为两个中心区域发展，故这一民族尊西北方位。所以，禹都阳城遗址和夏都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均坐西北朝东南，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掘的大量墓葬也是如此朝向。周人也是自西北方向入主中原的一个民族，自然是把西北方向尊为吉向，由东周王城、蔡国、晋国、赵国、郑韩故城的朝向也可看出对这种传统的继承。而商代都城重东北方位是一个普遍现象，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殷墟都城、黄陂盘龙城、夏县东下冯商城、焦作府城商代城址、安阳洹北商城等都是如此。新发现的两座城址——焦作府城商代早期方国城址和安阳洹北商代中期都城城址，也都显示了以东北方位为重的规划意图。

殷墟发现的大墓墓向多是朝向东北方位也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实证。据杨锡璋先生统计，自殷墟发掘以来，据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资料，共发现了带墓道的大墓三十二座，其中，四条墓道的大墓八座，全集中在西北冈；两条墓道的大墓八座——西北冈三座，后冈四座，大司空村一座；一条墓道的大墓十六座——

西北冈两座，大司空村三座，后冈一座，殷虚西区十座。除大司空村有两座一条墓道的墓其墓道是在墓室北侧外，其余全在南侧。即有三十座是北向的。但是，这些墓并不是正北向的，而是北偏东。因此，可以说，殷代王室和高级贵族的墓的方向，绝大多数是北偏东的。殷虚大墓的墓向为东北方向说明真正代表商族血统后裔的商代王室及高级贵族把东北方向当作尊位。殷虚西北冈大墓的排列位置关系也表明了殷人尊东北方位。安阳殷虚西北冈墓地是商代后期的王陵区所在，这里分布着13座大墓，其排列以M1001位于最东北，其子孙墓列于其西南，东北方位为尊的传统一目了然。墓葬的头向体现着古代民族对族源的怀念和关注，隐含着墓主人死后其灵魂返祖归根的理念。所以，这可成为商族族源在东北的一个佐证。

结 语

有着独特经济特色和原生宗教文化特色的红山文化，在西辽河为流域尽管没有最终形成文明，但其文明因素的地积累是厚重的。这种厚重，不仅仅表现为平底筒形罐、之字纹、拥有大型石器及与细石器并存而昭示的文化内涵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多种经济并存导致的史前原生宗教和巫文化的发达，并由此逐步形成的巫觋——巫师——祭师——

祭司集团。正是这个阶层的出现、形成和壮大，逐渐取代族权形成神权，并以神的名义迅速构建起具有行政功能的权力框架即政权的初始形态。这些文明因素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即是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透射出的文明前夜的曙光。然而五千年左右的降温事件导致了红山文化主体人群的南徙，并成为先商文明的重要源头。这不仅大量的古文献中有相应记载，更重要的考古学线索是红山文化独特的埋葬习俗——石棺葬在京津唐地区乃至河南鹤壁刘庄先商文化墓地出现，表明了红山文化先民的后裔在近千年的岁月中，沿渤海岸、过京津唐、驻足漳河流域，最后抵达河南腹地所经历的漫长的南徙过程，最终成为先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中间尚有缺环，一些环节尚需今后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但这种渊源关系和发展脉络已毋庸置疑。我们同时认为，红山文化与先商文化的渊源关系，不仅线索清晰有据可证；而且先商文明的形成并非中原某一单一的土著文化独立发展而成，而是多种文化因素经过长期的碰撞、交融最终形成的结果。

注释：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5页。
参见徐光冀：《红山文化的新发现》，《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第175页。
郭大顺、马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杨虎：《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年第8期。
吕军：《红山文化玉器研究》，《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刘国祥：《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第163—178页。
吕军：《红山文化玉器研究》，《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郭大顺：《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
崔之久等：《初论古文化类型演替与传承模式的区域分析》，《第四纪研究》第22卷第5期2002年9月
李永化、张小咏：《辽西地区新石器时期青铜时代耕作业的兴衰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人文地理》第19卷第5期2004年10月
夏正楷等：《内蒙古西拉沐沦河流域考古文化演变的地貌背景分析》《地理学报》第55卷第3期2000年5月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科学出版社 2004
辽宁省文化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9年。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所：《白音长汗》512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汤卓炜：《环境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233页。
李永化，张小咏：《辽西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耕作业的兴衰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人文地理》第19卷第5期，2004年10月
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式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J]科学通报46（20）1725—1730。

翦伯赞：《商族的起源与古代国家的建立》，《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128页

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305-

314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ХУРААНГУЙ

Шю Зифэн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ЫН ДУНДАД УЛСЫН СОЁЛД ЭЗЛЭХ БАЙР СУУРЬ БА НӨЛӨӨ

I.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ын агуулгын онцлог шинжид хичээнгүйгээр нотлолт ба задлалт хийж, өмнөх үеийн судалгааны суурин дээр аж ахуйн төлөв байдлын талаар дахин нарийн шинжиж үзвэл

1-рт. Уулын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 нь балар тариалангаар голлосон аж ахуйтай байсан гэдэг дурдлага нь оновчгүй юм. Шар мөрнөөс хойш байгаа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ын үлдэгдлээр жишэлбэл тариалан ба ан агнуур, тэжээвэр, түүнийг цуглуулах, загасны ан агнуурын зэрэг аж ахуйн төрөлтэй байжээ. Үүнээс үзэхэд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ын нийгэм нь балар тариалангаар голлосон аж ахуй биш байж харин олон зүйлийн аж ахуй хосолсон шинжтэй.

2-рт.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ын тухай өмнөх үеийн Шин лүн ва болон Шиоу хэ еин -ийн соёлын олдвор болох чулуун тээрмийг тариалангийн багаж гэж ганц талын таамаглал нь дутмаг шиг байна. Эдгээр чулуун багаж нь арьс шир элддэг багаж байж ч болох магадлал нь их байна. (Зарим чулуун шийдэм нь бөөрөнхий биш байж, тээрэм нь хотгор биш учраас будаа цайруулах боломжгүй). Бас 8500 жилийн өмнөх Шиоу хэ еин-ийн соёлын үед будаа тарианы үр олдсонгүй.

II. Зарим ном материалд дурдсан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ын чулуун булшны эзний бие гарлын тухай “Ван эзэн”-ий булш гэх үзлийг тус номондоо зөвшөөрсөнгүй.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ын хамгийн хөгжилтэй үед овог төрлийн ахлагч нь бөө удган байсан учраас ван эзэн үгүй байв.

III.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 дахь эмэгтэй сахиус нь тухайн үеийн иргэдийн дээдэс нь биш юм. Тус эмэгтэй сахиусын хөрөг нь том шувуу, гахайн дүрст луутай хамт тавигдаж байсан учраас газрын сахиус юм уу, тахилын сахиул болно. Харин дээдсийн сүнсний тахилгатай холбоогүй.

IV. Умардын үндэсний үүслийн асуудлын тухай үзэхдээ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 нь 6500-5000 оны хооронд баруун Ляо хэ голын сав газар ба Еин-шан уулын өмнө хойно газарт их олон боловсон элементийг үлдээж, хэдийгээр сүүлийн үеийн Нью Хэ Лян зэрэг том тахилга тайлгын сүмтэй болсон ч нэн боловсоны өмнөх үе байжээ.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 нь Ляо хэ голын сав газраар боловсон нийгэмд хүрч чадсангүй ээ.

V.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ын уугуул шашин нь умардын үндэстний боловсныг бүтээхэд чухал нөлөө гаргасны тухай өвөрмөц задлалт хийж өгүүлжээ. Үүнд: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ын боловсоны элементийн бүрэлдэхүүн хөгжлийн хэв маяг болон барууны боловсон, дундад орны соёлын боловсонтой их зөрөөтэй байдаг.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ын нийгмийн боловсоны бүрэлдэн хөгжсөн явц нь овог төрөл эрх-шашны эрх-засгийн эрх гэх ийм гурван шат үеийг өнгөрөөжээ. Энэ нь онцгой аж ахуйн хэлбэр ба Байгаль орчны нөлөөнөөс болж нийгмийн тахилга тайлгын үйл туйлын олон байж бөө удган олон болж овог төрлийн ахлагчийн хүчнээс томорсон сахиус бөөгийн ахлагч бий болжээ.

ҮІ. Хамгийн сүүлчийн хэсгийн онцлог нэн тодорхой байж,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ын болон Шан улсын соёлын харилцааг нотолжээ.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 нь 5000 жилийн үед гэнэт алга болсны учир нь ихэнх хүмүүс өмнөш нүүдэллэсэн байна. Сүүлчийн Шан үндэстэн нь Умардын үндэстэн байж улаан хадны соёлыг бүтээгч иргэд бол тэдний дээдэс болно гэдгийг сурвалж бичиг,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болон антроп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гаар шалган нотолжээ.